

China's Reforms: Compared to Those of Mikhail Gorbachev

演講者：Professor Thomas P. Bernstei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榮譽退休教授

時間：2008年12月4日

地點：台大公衛學院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於2008年12月合辦的Reflections o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after 30 Years系列演講，請到Thomas P. Bernstein和Dorothy J. Solinger兩位知名學者帶來精彩的演講。

Bernstein教授的講題是"China's Reforms: Compared to Those of Mikhail Gorbachev"，分析中國和蘇聯自社會主義政體邁向改革的不同道路，並註解了中蘇兩國前者轉型成功與後者崩潰解體背後的歷史結構。

Bernstein教授在演講之初引了一段話：「有人說：『中國之所以轉型成功，是因為中國專注於經濟轉型；而蘇聯之所以失敗，在於戈巴契夫過於激進快速的政治轉型，最終導致政權解體』」。Bernstein教授反駁了這個論點，因為它過於簡化了兩者轉型的方向：認為中國是經濟轉型，蘇聯是政治轉型。實際上，Bernstein教授表

示：「這兩個國家都同時追求經濟和政治結構的轉型」。

Bernstein教授分別用「威權統治架構下的政治轉型」(political reforms undertaken within a framework of continued authoritarian)和「政治自由化」(political liberalization)來形容中國與俄國的政治轉型。蘇聯因為採取了政治自由化的途徑，導致統治者權力稀釋、允許其他政治力量組織以及媒體自由報導，這些都挑戰了既有的政治系統。完全而徹底的民主選舉讓社會騷動，因為它不可避免地導致進一步民主化。可以說，政治自由化的門一旦被開啟，政治領袖就不可避免地被社會壓力推向民主深化，在這種情況下，政治領袖的選擇只有兩種：奪回獨占政治的權力、回歸獨裁，或者向大眾和社會菁英的壓力屈服、走向民主。而蘇聯和東歐的情況明顯屬於後者。

相較之下，中國強調提升現有政治系統的理性和功能性，中國的策略目標為接受並適應市場經濟和增加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政府首先結束了在毛時代的極權統治模式之下，以意識形態為轉型目的，以政府為首，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對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緊密控制。經歷長年的動盪，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後，這樣的社會動員幾乎被徹底拋棄。整體來說，中國自此正式從極權主義轉向威權主義統治型態。黨國退出部份社會、經濟領域，大量減少了要求個人利益從屬於集體利益的政治需求，刺激個人追求物質利益的動機。較為鬆綁的系統也容許官方菁英參與協商，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極大化。為了適應市場經濟，尤其為了吸引外國企業投資，一個以法制為基礎的體



講者 Bernstein 教授與主持人吳玉山教授。

系逐漸形成，取代了計畫經濟制度。地方政府也在對黨國忠誠的前提下，被允許追求地方發展。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牢牢把持著對過去歷史的詮釋權，透過強化毛澤東對過去的貢獻來鞏固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在中國，政治權力也仍是被壟斷的，雖然法律建制看似完善，但這不代表政府從此向人民負責，也就是說，中國政府不具有所謂的「問責性」(accountability)。Bernstein 教授指出，中國政府仍然具有相當程度不受監管的權力。

雖然中國的改革主要著重於經濟，但中國未能走向政治自由化的關鍵在於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和 1991 年的蘇聯解體。雖然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是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官僚腐敗，但走上街頭的民眾和學生讓中國政府瞭解到對社會的管制不能放鬆、對於威脅統治的對象可以軍隊鎮壓。蘇聯解體更是讓中國政府覺悟絕對不能透過自由化的途徑來解決現有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整體來說，Bernstein 教授認為戈巴契夫試圖

進行一個全面改革，除了國內政策之外，還包括國際政策和軍事政策。然而這樣的操作立刻引起反彈，尤其那些因此受到影響的階級，進而促使戈巴契夫進行政治自由化，但他低估了這些被釋放出來的政治力和社會力可能產生的兩極化效應。戈巴契夫的改革幅度太大且速度太快，就像清末的戊戌變法一樣，低估了結構性變革的難度，最終導致政權崩潰。而中國採取的是一種漸進的模式，涵括經濟成長和對外開放，中國的改革先從區域開始才擴展到全國，農村改革成功之後，改革的腳步才踏進城市。相較之下，中國的結構轉型無疑是比較成功的。

現階段，中國面臨了轉型過程中帶來的問題，貧富差距正逐漸威脅到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在過去因過度發展而導致的環境問題，也逐漸成為當前中國政府無法逃避的困局。Bernstein 教授最後提出一個疑問：目前要求政治自由化的社會壓力仍在持續，中國政府究竟還能抵擋多久？

(整理：潘韋岑)